

## 「起朝儀」與劉邦權威的再建： 以《史記》為核心的觀察

沈潤遠<sup>1</sup>

### 摘要

本文旨在剖析西漢初期叔孫通的「起朝儀」，如何透過新朝儀再建劉邦的帝王權威。全文分成五個部分：首先，前言會比較扼要地透過研究回顧來凸顯討論議題。接著，揭櫫建構新朝儀的因素以及叔孫通揀選的標準。第三部分，則論述新朝儀的推展，所仰賴與凸顯的象徵。第四部分，則為全文的核心內容，著重在解析朝儀如何透過多面向重建劉邦權威及其隱含的重點。最後透過總結全文，引申新朝儀的意義。

**關鍵詞：**劉邦、權威、尊卑、君臣、新朝儀

---

<sup>1</sup>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通訊作者：沈潤遠，E-mail: loonwan85@gmail.com  
收稿日期：2023/04/06；接受刊登日期：2023/06/26  
DOI:10.6284/NPUSTHSSR.202306\_17(2).5

## 壹、前言

西漢初期儒生群體與劉邦統治階層互動的複雜性，是在衝突中尋找合作的契機。基於他們與統治階層對彼此的需求不同，前者相較後者的仰賴性更高，亟需政治平台實踐儒家學說。然則又限於現實使然，軍事人材的需求量大，內部形成以軍功成為衡量存在價值的標準。因此，無法處在戰爭前線殺敵致果的儒生屢受敵視，其身份亦成為指摘焦點。

儘管以劉邦(256-195B.C.)為首的統治階層輕視儒生群體，處處箝制入仕的途徑，刻意壓縮他們在政治空間大展拳腳。然則儒生卻充分發揮能動性，在政治結構的夾縫中，以說客、謁者，或兵員引薦者的身份，尋找機遇展現儒家學說的價值，冀望轉化邊緣的地位。身為儒生的叔孫通(?-?)、酈食其(?-204B.C.)、隨何(?-?)等，歷經艱難曲折的歷程，闡明他們與統治階層互動時的暗流洶湧。從另一側影，亦彰顯儒生奉為圭臬的儒家學說紮根於西漢，不是從排斥到採納的順遂過程。

隨著天下時勢初定而休兵罷戰，劉邦的帝王權威意識愈趨強烈。<sup>1</sup>漢七年(200B.C.)叔孫通協同弟子「起朝儀」一事，對荏劉邦重整朝儀秩序的願望，透過重構大朝會的儀式，<sup>2</sup>再建劉邦至高至上的權威。<sup>3</sup>鑑於此，叔孫通擢升為太常，其他參與製定朝儀者，也「悉以為郎」，象徵著統治階層對他們的鬆綁。<sup>4</sup>

<sup>1</sup> 本文採用的「權威」含義：取得合法地位、職位後行使的權力，且又具有影響他人行為的能力，影響與受影響的雙方，都公認正當的權力。以「權威」作為表述，即契合劉邦帝王身份、擁有至高權力，且又被群臣認為正當的事實。與此同時，又對荏他與人臣層級相異的事實，以及兩者對權威觀點的一致性——即承認帝王身份之尊貴，從劉邦、太公家令、蕭何的看法可知（劉邦贊同家臣認為跪拜太公會導致帝王「威重不行」、蕭何(?-193B.C.)大事擴建未央宮被批而澄清「非壯麗無以重威」，劉邦先怒後喜）相吻合。參見鄧偉志：《社會學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頁81。

<sup>2</sup> 「起朝儀」的內涵有必要進行闡明。關於此，渡邊信一郎對元會（即楊寬的「大朝會」、「元會議」，楊氏並無統一的用法）的研究，透過禮儀程序得見朝會內涵：一，參加者列隊、殿前待詔。二，進入殿後整列，設定席次。三，皇帝抵達會場，臣子獻賀詞。四，酒禮。基本上渡邊的敘述，叔孫通本傳裡不難找到對應。換言之，叔孫通的「起朝儀」，除了是以西漢元旦歲首，以祝賀、酒宴構成的大朝會外，實際上也涵蓋日常的朝會禮儀，畢竟朝儀也包含日常上朝時的早朝。基於叔孫通傳裏記載的是他在元旦大朝會裏的朝儀，為便於敘述與聚焦，故本文選擇以「大朝會」稱之，沿襲楊寬的名詞使用，也符合東漢荀悅(148-209)追述劉邦「大朝會長樂宮」的例證。不過，這並不代表叔孫通只是改革大朝會的朝儀而已，這點有必要率先說明。分別見渡邊信一郎：〈元會的建構——中國古代帝國的朝政與禮儀〉，收入溝口雄三、小島毅主編，孫歌等譯：《中國的思維世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366；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189-191；東漢·荀悅撰，見張烈點校：《兩漢記》卷3（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44。

<sup>3</sup> 至於選擇以「再建」解釋重新建構的劉邦權威，依準在於：「再建」相對於確立，是奠基在既有的權威基礎上（劉邦擁有影響他人行為的能力，只是權力不彰），闡明權威可透過具體的事物來建立（如儀式），從新朝儀舉辦後劉邦獲得極大的尊貴感，顯然可見。

<sup>4</sup> 實踐禮儀有專業性：「此眾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因此，儒生掌握禮儀的專業學問，形成他們可靠的保障，也成為壟斷的基礎。畢竟改造、實踐各種禮儀，非熟悉儀式的儒生不可，禮儀的踵事增華，也意味著對儒生的需求增多。伴隨著儒生隊伍愈加壯大，發揮的影響力也隨之擴大。東漢·鄭玄註，唐·孔穎達疏，龔抗雲整理，王文錦審定：《禮

「起朝儀」作為關鍵性的事件，受到的關注更傾向於價值層面的評議，針對叔孫通個人與朝儀性質的評斷實繁有徒。徐復觀先生（1904-1982）評論叔孫通：「投機是出賣自己的良心與知識」來獲取現實利益、開啟尊君卑臣的先河。<sup>5</sup>分別就手段、目的、結果的負面描述，例如南宋儒學大家朱熹（1130-1200）的評價。<sup>6</sup>反之，亦有贊同者，<sup>7</sup>幾乎總括前人林林總總奠基在儒家本位視域的評議。<sup>8</sup>相關評價的去脈絡化，淡化了楚漢相爭亟須軍事人材而壓縮儒生生存空間的背景，相對弱勢的儒生，因而無法憑藉主動權論述儒家學說的可塑性。相反的，以儒家理想人格抵消叔孫通與朝儀的正面性，既忽視他們竭力維護儒家學說，起朝儀不過是多次碰壁後，萬不得已的嘗試；同時也輕描淡寫「起朝儀」背後的深沉誘因，連帶朝儀重新確認君臣尊卑關係的正面作用，受到某種程度的忽略。

評論的另一側，則是嘗試超越道德屬性與朝儀本質的論斷，從宏觀的政治史角度論述漢初統治階層與朝儀出現的意義。林聰舜闡發韋伯（Max Weber, 1864-1920）三種統治的分類，點出劉邦具備魅力型（Charisma）領袖特質，在穩定漢朝治理根基時，魅力型領袖特質的消極性不適用於大一統的西漢王朝。緣於此，他借助朝儀進行轉化制度所賦予無上權威，確保制度保障統治秩序與傳統，是趨勢使然的必然結果。與此同時，朝儀展現行使的強制性、規範化實現上下秩序的重建，所展示的禮儀隱藏著法家的影子，暗示了朝廷儀式與劉邦為首的統治階層，隱含著從俗浮沉的現實性關係。<sup>9</sup>儘管如此，文章更多是由外而內——而不是從朝儀進行的細節著眼分析。<sup>10</sup>縱使注意到朝會，研究成果更偏向於訓詁釋義，

記正義》卷 63，收入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整理，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668。

<sup>5</sup>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臺北：學生書局，1976 年），頁 414-415。

<sup>6</sup> 「叔孫通為綿繆之儀，其效至於群臣震恐，無敢喧嘩失禮者。比之三代燕享群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宋·黃士毅編，徐時儀、楊艷彙校：《朱子語類彙校·歷代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頁 3196。

<sup>7</sup> 「夫世無百年之運，人無百年之世，信如兩生所言，則雖聖賢亦耳然耳。」明·李贄：《藏書》卷 9（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頁 506。

<sup>8</sup> 這種儒家本位思考，是考慮到脈絡化評論者的身份背景，他們往往以符合或貼近儒家思想裡的某個主張、原則來權衡它的純粹性。李莉：〈新時期以來儒家學說與漢初政治關係研究述評〉，《史學月刊》第 8 期（2016 年 8 月），頁 120-122。

<sup>9</sup> 林聰舜：〈叔孫通「起朝儀」的意義——劉邦卡理斯瑪支配的轉變〉，《哲學與文化》第 235 期（1993 年 12 月），頁 1154-62。修改版收入林聰舜：《漢代儒學別裁：帝國意識形態的形成與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 年），頁 33-51。

<sup>10</sup> 類似的成果相當多，幾乎不從朝儀細節著眼，而是以宏觀的角度敘述叔孫通與漢初儒學的關係。除李莉〈新時期以來儒家學說與漢初政治關係研究述評〉文內所錄文章外，諸如李冰楠：〈叔孫通制禮再評析——以與同時期儒生的聯合考察為中心〉，《河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2 卷第 1 期（2021 年 1 月），頁 87-93；劉力、李燦：〈叔孫通「起朝儀」的禮樂之制與皇帝制度的重塑〉，《重慶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6 期（2020 年 12 月），頁 25-32；王子初：〈漢初的禮樂重建與叔孫通〉，《中國音樂》第 2 期（2018 年 3 月），頁 23-34；孔維京、王燕：〈漢初禮法流變探微——以叔孫通「製禮作樂」為中心〉，《大連大學學報》第 38 卷第 4 期（2017 年 8 月），頁 29-33；楊鑫：〈叔孫通之「進退與時變化」與漢代儒學的轉向〉，《孔子研究》第 2 期（2016 年 3 月），頁 86-92；楊賽：〈叔孫通與漢初製樂〉，《音樂藝術》第 3 期（2015 年），頁 82-91；傅志傑、李俊芳：〈叔孫通制朝禮新探〉，《保定學院學報》第 27 卷第 3 期（2014 年 5 月），頁 48-51；強中華：〈叔孫通儒學實踐批判之批判〉，《西南交通

且把朝會獨立出來，而非視作事件來看待。<sup>11</sup>

前行研究固已指示出起朝儀與帝王的後續性治理，有勢之使然的因素所導致。本文不打算重複論證劉邦為何透過朝儀轉化個人統治的因素，而是冀望在其基礎上作更進一步的審視：以新朝儀作為核心，檢視它發生的因素，進而詮釋朝儀推展的合理性，如何透過排練、排場、排序等運作，營造君臣之間的階級感（或距離感）。特別是司馬遷《史記》記錄朝儀舉辦的流程，次序前後、參與者位階、操作演練等，基本上成為後世學人考察朝廷儀式的關鍵史料。《史記》的文獻形式，有別於其他史料類型的特點。伴隨著出土文物的挖掘，漢代宴飲圖極大地豐富研究成果。儘管如此，圖像靜態的剎那記錄，更傾向於宴飲空間的彌補與修正。移動性的流程、次序等，非仰賴文獻的助益不可。更何況，目前為止尚未發掘到關於大朝會宴飲圖像。<sup>12</sup>基於司馬遷（約 145-86B.C.）身份，<sup>13</sup>及其備受肯定的可靠性，<sup>14</sup>《史記》關於朝儀敘述，<sup>15</sup>無論從廣泛的史料意義，抑或記敘朝儀內容，都具有分析與詮釋的價值。儘管所記不長，不過釐清新朝儀如何建構帝王權威，研究意義自然彌足珍貴。本文思考源自於此，開展的研究進路為：

第一，挖掘「起朝儀」推展的誘因。禮儀制度不是憑空出現，它必然是特定時空下，為人所主導的產物。既然如此，朝儀的發生背景為何？鑑於「起朝儀」關涉到重整君臣上下關係，它如何因應人君需求來建構，又如何確保新朝儀順利推出？第二，解析新朝儀如何塑立劉邦的帝王權威。特別是處在場域裡，必然在兩個位階相對高低、某個時空的前提下進行操作。朝儀如何仰賴排序、排場、排位等，在短時期內透過運轉來確立尊卑關係？是單純指向君臣，抑或臣子之間的尊卑位階？接續如何持續強化？此部分是構成論述的主要部分。上述兩個問題，前者嘗試回應西漢初期朝儀建構得以開展的緣由；後者則是論述朝儀如何操作，重新建構尊卑關係的疑問。兩個疑問的解答，讓我們從比較微觀的角度，展示西

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1 卷第 6 期（2010 年 12 月），頁 120-124；王勇：〈論叔孫通制禮作樂兼採楚俗〉，《湖南科技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11 期（2007 年 11 月），頁 10-12。

<sup>11</sup> 傅志傑、李俊芳：〈漢代大朝會相關問題研究〉，《商丘師範學院學報》第 30 卷第 7 期（2014 年 7 月），頁 43-46。

<sup>12</sup> 徐光冀主編：《中國出土壁畫全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 年），頁 165。

<sup>13</sup> 作為太史令，司馬遷得到其父司馬談（約 165-110B.C.）的史料儲備以外，還得窺秘府裡豐富的文獻資源，因而自言：「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加上各種田野考察、口述資料，取得多元材料與方法的相互檢驗。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太史公自序》卷 130（臺北：大安出版社，1998 年），頁 1346。

<sup>14</sup> 後世同儕的正面評價：除了劉向（79-8B.C.）、揚雄（53B.C.-18）對《史記》的「實錄」的讚許之外，大量沿襲司馬遷資料的班固，其評語：「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儘管有學者對此評語源自班彪或班固（32-92）持保留態度，但班固不更動相當於表明了立場）況且，班固對資料有後發優勢，卻仍然保留相關記載，足以支持司馬遷敘述的可靠性。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司馬遷傳》卷 62（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頁 2738。

<sup>15</sup> 從司馬遷「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的自陳，加之他在秘府接觸非公開性的文獻資源，他很有可能閱讀過進行朝儀相關規定的檔案。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禮書》，頁 410。

漢初朝儀如何比較圓滿地處理位階混亂的問題。鑑於此，本文首先分析新朝儀開展的緣由，以及詮釋朝儀順利開展所運用的策略。接著透過新朝儀舉辦的解析，勾勒它如何建立尊卑次序。當然，借助朝儀與權威的解釋，不會是唯一的詮釋，這點是必須預先澄清的。

## 貳、新朝儀的開展：一個聚焦於群臣「爭功」的解決方案

秦末爆發反秦的戰爭，群雄之中，以項羽（約 232-202B.C.）、劉邦各自引領的楚、漢相爭奪，最終以劉漢政權的勝利畫下句點，時在漢五年（202B.C.）。儘管劉邦作為優勝者，他的合法性既是追隨者自覺認同，同時也是逐漸說服大眾而取得的結果。<sup>16</sup>毫無疑問，劉邦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不過他作為人君在行使權威過程中，頗多受到人臣的衝擊與挑戰。新朝儀建構的經歷，實際上也因應問題的產生，爾後劉邦意識到問題，再藉由叔孫通解決問題的經過。

劉邦奠基漢朝基礎後，厭惡縟禮煩儀，<sup>17</sup>因而一反秦朝嚴苛的禮儀，簡化易行成為核心原則。歸根結蒂，劉邦對草莽特質的屬臣，采取簡化禮節的舉措，削弱了禮儀對階級的約束力量，進而導出群臣禮儀失控的重要誘因。司馬遷的一段歷史記敘：

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sup>18</sup>

簡短的一段話，因果並敘。由於缺乏有效的禮儀約束，人臣才有從飲酒爭功，醉後妄呼，再到最嚴重的拔劍擊柱，混亂的狀態層層遞進。這段敘述彰顯了兩種層

<sup>16</sup> 劉漢政權是他們擁戴的結果，同時也是他在征戰中契合集團需求，逐漸說服眾人所取得。「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甲午，乃即皇帝位汜水之陽。」《史記》縮寫疏文，將《漢書》的諸位異姓王「於是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味死再拜言』」，以「諸侯及將相」輕筆帶過。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高祖本紀》，頁 169；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高帝紀》卷 1 下，頁 52。

<sup>17</sup> 劉邦對禮儀功能的評估無從得知，但從〈陳丞相世家〉的第三方敘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魏豹彭越列傳〉裏魏豹（？-204B.C.）的「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他不甚看重禮儀，對禮的作用在認知上比較薄弱，大概可推想之。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頁 794、1029。

<sup>18</sup> 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劉敬叔孫通列傳》，頁 1086。

次的失序：第一層面，下位者對相對上位者的挑戰（人臣之間）。劉邦屬下內部，不少彼此之間對於軍功的標準存在差異。尤其是臣屬爭功，已經延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sup>19</sup>更深層面而言，是人臣對於人主權威的挑戰（君臣之間）。縱然論功定賞，是由劉邦親自應允且裁定，但公開場域對其他功臣的質疑，亦伴隨著對劉邦決定的質疑。劉邦多次平息他與臣子、臣子之間的糾紛，似乎得不到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sup>20</sup>進一步而言，無論是劉邦個人權威，抑或借助既存的簡易禮儀，他都無法有效地控制、約束（或使下屬妥協）臣子的放肆行為。楚漢相爭時「斬將奪旗」的人臣，卻在漢朝建立後，成為尊卑關係的破壞者。況且這種失序也關係到自身安全的疑慮，不再是純粹性、偶發的未形之患，它嚴重破壞帝王所應具備的超然權威。劉邦自身亦不曉得，人臣之間的對抗，會否在某一天深化並延伸到對抗劉漢政權。<sup>21</sup>

禮儀不彰的紊亂，間中蘊藏着的危險，也進一步誘發劉邦強化帝王權威意識的萌芽。這種認知萌生於漢朝建立後至起朝儀之前的兩年裡，我們合理推測，它不太可能是由劉邦個人一時興起的情緒主導，而是意識到建構帝王權威必要性後採取的舉措。司馬遷《史記》裡敘述太公（？-197B.C.）被尊為太上皇的緣由，往往被學者淡化：

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心善家令言，賜金五百斤。<sup>22</sup>

<sup>19</sup> 〈蕭相國世家〉：「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群臣爭功，歲餘功不決」；又〈留侯世家〉裡敘述漢六年時，「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最後借助封賞雍齒來暫時緩解軍功分配的爭執，都一再說明封賞的困難、爭論持續時間之長。據此狀況觀察，相當有可能發生在打敗項羽後漢五年之後，到叔孫通在漢七年建議整頓朝儀之前。這點亦與司馬遷敘述漢五年劉邦簡化秦苛儀法後，造成人臣爭功妄呼的狀況相契合。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頁 776、788。

<sup>20</sup> 這類的裁定頗多，特別是劉邦與群臣之間對於功勞標準的認知有落差，它往往需要借助劉邦的權威加持，才能勉強平息。大至〈蕭相國世家〉關於蕭何的功績，劉邦還刻意以獵人與獵狗的譬喻，以及舉其宗族數十人相助來平息臣子的質疑；小至〈黥布列傳〉裏隨何需要獲得劉邦提供自數功勞的機會，比附以軍隊的數量來凸顯自己的軍事貢獻，這點與功臣單獨以攻城之功來衡量曹參功勞最大的標準，卻被劉邦否決，兩者顯然有差。此外，張良（？-約 186B.C.）無軍功而封侯，亦說明劉邦認知的軍功，不僅僅是戰術層面的攻城殺敵而已，還包括戰略、後勤補給的範疇。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頁 776、1034。

<sup>21</sup> 這些經由幾個面向得以觀察出來：首先就叔孫通推薦攻城略地的人材，引發弟子們的議論而以「諸生寧能鬪乎」回應，淡化儒生比較不擅長軍事活動正面衝突的劣勢。正如他後來以「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說服劉邦，以守成來彰顯儒生的可能性。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劉敬叔孫通列傳》，頁 1086。

<sup>22</sup> 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高祖本紀》，頁 170-171。

這件事看似小事一椿，似乎只是劉邦的順水人情，實則不然，它牽動著從私領域轉向公領域、君臣與父子禮儀優先性的問題。倘若遵照平民的父子禮儀，則劉邦的權威無法逾越父子的倫理血緣；反之威重先行，則人君權威的超越性，與天、地之間有並駕齊驅的超然地位。<sup>23</sup>更為關鍵的是：透過與劉邦有緊密血緣關係的太公來率先垂範，在某個層面更是彰顯他帝王威儀，就連親如太公也毫無例外，況且在父子倫理之外的君臣關係？值得關注的是，劉邦面褒獎的處理模式，也進一步承認帝王權威凌駕於一切的崇高地位，塑造自身權威意識的呼之欲出。換言之，劉邦接納叔孫通立朝儀的建議，並非一時興致而已，它在相當程度上反映劉邦建構帝王權威的願望。儘管太公意識到劉邦貴為人主的超然地位，但訴諸於個體自覺，要求人臣都俱備似乎不太可能。為此，叔孫通建議朝儀作為外部力量的介入導正，便成為劉邦欣然接受的一種嘗試。

仔細考察，關於羣臣飲酒爭功的混亂，從劉邦的「患之」，再到叔孫通覺察到「上益厭之」，才順勢提出「共起朝儀」，暗示類似情況持續了相當時間。作為秦朝舊臣的叔孫通，自身應該俱備基本的禮儀知識，<sup>24</sup>加上他從劉邦降伏彭城後（205B.C.）投身劉邦陣營裡，很可能目睹功臣禮儀不彰的混亂場面，主要因素是簡化過當而起。儘管我們無可得知人臣失態時所參與的慶祝活動，但叔孫通有意選擇大朝會作為基點，似乎也暗示它的特殊性，以及清源正本：由酒宴始，由酒宴終來根治問題。畢竟一年一度的大朝會俱備的公開性與重要性，它是展現差異性的最佳舞台，<sup>25</sup>以此確立與強化人臣身份的自覺性，再建人君與人臣的新關係，類似的特殊節日是難得的機遇。縱使歲首朝會講求的是同樂，但它同時也是執行禮儀的重要場合。

<sup>23</sup> 劉邦將太公拜為太上皇，自己作為皇帝行朝拜之禮，就無人主拜人臣的亂法行為。雖然這樣的象徵意義大於實質，但他刻意為之，顯然不是言語層面的贊同而已。〈高帝紀〉保存了相關的詔令：「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群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頁 62。

<sup>24</sup> 劉邦稱帝時所上的種種封號儀式由他參與其中，加上他徵引魯國儒生三十人協助建構朝儀，他至少清楚解決問題需要尋求協助的對象。為建構新朝儀，他自身從魯地擁有豐富的古禮知識的儒生群體裡，徵求參與建構朝會經驗的儒生，并非不可能。「魯中諸儒尚講誦禮樂」（〈儒林列傳〉卷 121）、「守禮義」（〈項羽本紀〉卷 7）。漢武帝（157-87B.C.）時，仍然有「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孝武本紀〉卷 12）、「生子當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三王世家〉卷 60）、「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嚮嚮」（〈貨殖列傳〉卷 129）的說法。

<sup>25</sup> 朝儀本身就有公開性，是身份、官職、權力更有參差的官員齊聚的難得機遇。僅僅透過司馬遷簡約的記述，參與者就有：功臣、列侯、軍吏、丞相、郎中、侍衛等，文官、武官，基本上涵蓋的性質有：文／武、地方／中央、功臣／非功臣集團、劉氏血緣性／非劉氏血緣性等，各個層級概括在內可知。

鑑於此緣由，叔孫通率先提出共起朝儀的重要策略，可謂精準地對焦問題發生的破口，甚至不惜違背積德百年後才制定禮樂的傳統。<sup>26</sup>同時也把握了大朝會的特點。特別是這段耳聞能詳的君臣對話：

「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sup>27</sup>

由叔孫通提出的解決方案：以朝儀為主軸，採用「古禮與秦儀雜就之」的做法。在某個程度上，彰顯了新儀式取材於已存在的象徵素材，由製禮者為達成禮儀成效面向而決定的特色。<sup>28</sup>叔孫通新朝儀的建構標準，他自言更聚焦在禮儀傳承的時代差異性，而非延續性的面向，似乎是有意為之。<sup>29</sup>

進一步觀察，從劉邦「無難」的疑問，到要求「試為之」、「令易知」、「吾所能行」的指示，都是聚焦在禮儀操作難易的問題，而不是能否解決難題的層面上。這進一步闡明：從「試為之」顯示劉邦對於禮儀功能的薄弱信心，投射出他自身很有可能並無意識到問題癥結所在，只是意識到問題本身。叔孫通對策的針對性，不排除他觀察到劉邦為求省事簡化秦苛儀，將自身與人臣必須承擔的繁瑣禮儀一併解除，引發禮儀功能失序的對症下藥。鑑於此，叔孫通就有必要回頭尋找秦儀，在清晰地劃分臣子、君臣之間的尊卑區別，同時也要契合劉邦認知層面上的「易知」、操作層面上「所能行為之」的條件。禮儀的執行涉及人與人的互動，因此在劉邦開設的兩個條件以外，還必須面對人臣：如何在人臣群體失序的慣性，透過新規則的設定，導正他們過去的錯誤行為，就有必要重新賦予新朝儀的象徵。

<sup>26</sup> 從叔孫通取得劉邦核准後，欲訴諸於魯地儒生權威而遭到拒絕可知，儒生群體內部對於制定禮儀的標準存在一定的落差。惟叔孫通領導的儒生及參與者，更關注的是論證儒家學說的功能，主動抓住難得的機遇。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劉敬叔孫通列傳》，頁1086。

<sup>27</sup> 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劉敬叔孫通列傳》，頁1086。

<sup>28</sup> 這種「雜就之」正好彰顯禮儀舊瓶裝新酒的特點，蓋因古代儀式往往無法完全還原其原生的狀態，儀式的連接很難保證其原生的完整性，但它同時又必須因應新的統治政權需求來調適。鑑於此，儀式往往擁有新舊並存的特質，也是儀式歷久不衰的重要因素。

<sup>29</sup> 儘管如此，叔孫通所執行的朝儀，恐怕是以延續性的面向居多，這點從司馬遷的一段話：「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很有可能是司馬遷閱讀國家檔案後的總結。叔孫通如此表述，不過因為漢推翻秦朝而代之，不能明說繼承秦朝的政治遺產，為此採取古禮來淡化秦儀的影子，是比較合理的推測。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禮書》，頁411。



## 參、「新」的象徵意義：新年、新宮殿、新朝儀

象徵俱備多義性的特質，有時限於經驗而有理解的差異性，但某些象徵的普遍性，是早已為人廣知並接受。尤其是政治擺脫不了象徵，象徵手段裡的儀式更是如此。基於人民無法感知抽象的國家、政治權力，政治結構中裡的權力者，惟有透過象徵性的儀式呈現大眾，讓他們感知象徵產物來認識它。<sup>30</sup>透過儀式的生產與使用，抽象模糊的尊卑高下階級，形象地顯現出來而為人所知曉。鑑於此，權力擁有者深諳象徵力量對建構自身權力、地位的不可或缺，無論是借用儀式建構或是破壞，往往運用具體的儀式象徵來建立差異性。劉邦在楚漢相爭取得勝利的果實後，在眾人擁戴下進行一系列的儀式活動，成功彰顯他帝王的位置；「白馬之盟」，深化與鞏固劉漢政權統治的合法性，效果昭彰。<sup>31</sup>倘若運用多個指涉比較清晰的象徵（例如新年、新宮殿、新朝儀所強調的嶄新意義），更能強化單個象徵所帶來的效果。為了重新確認君臣關係，叔孫通巧妙地對新年與新宮殿結合運用，強化與豐富開展新朝儀所蘊含的意義。歲首，作為新時間伊始的象徵；建峻的長樂宮，意味著新空間落成的象徵，成為叔孫通刻意運用象徵深化新朝儀的意義，被視作建構劉邦新權威的重要策略。

漢朝長樂宮是在秦朝宮殿的基礎上擴建而成。<sup>32</sup>依據史書記載：

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sup>33</sup>

又載：

二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

34

<sup>30</sup> 參考大衛·科澤（David Israel Kertzer）撰，王海洲譯：《儀式、政治與權力》（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頁3-10。

<sup>31</sup> 「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無論君臣哪方，從需要借助盟約建構自身或打擊敵對勢力，已然彰顯儀式的力量，姑且不論它是朝向團結或分裂的目的舉辦。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呂太后本紀》，頁182。有學者指出白馬盟約的真偽問題，例如劉鳴認為是後人偽纂白馬盟約，近年又有尹鵬、王文英撰文再論，惟學者多數認為有「白馬盟」一事。見劉鳴：〈「白馬之盟」真偽辨〉，《秦漢研究》第6輯（2012年8月），頁220-228；尹鵬、王文英：〈「白馬之盟」真偽探〉，《新鄉學院學報》第37卷第2期（2020年2月），頁56-59。

<sup>32</sup> 劉振東、張建鋒：〈西漢長樂宮遺址的發現與初步研究〉，《考古》第10期（2006年10月），頁22-23。

<sup>33</sup> 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劉敬叔孫通列傳》，頁1086。

<sup>34</sup> 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高祖本紀》，頁170-171。

在漢七年（200B.C.）十月之前就建峻，<sup>35</sup>新朝儀就借助這個新空間開展而成。長樂宮作為漢王朝議論要事的樞紐，同時也是帝王的居所，它的翻新不太可能簡單進行了事。<sup>36</sup>司馬遷細緻敘述未央宮的營建緣由，劉邦與蕭何之間的一段對話相當引人思考，或許可供參考：

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sup>37</sup>

兩人的對話，以蕭何的回應尤為關切，透露未央宮擴建的三個重要因素。首先，就當前漢王朝異姓諸侯王叛亂導致的不穩定性，透過輝煌的宮殿穩定眾心，以示天下即將迎來平定。其次，雄偉壯觀的未央宮，得以具體地向眾人彰顯劉邦個人的超然權威。最後立足在後人在未央宮基礎上無以復加，突出劉邦作為劉漢政權創建者最初、最大、最高的意義。進一步而言，蕭何的回應，既著眼於當前的現實面，也涉及未來；既有關涉群體信心的強化，同時也牽扯到個人權威的面向。從三個答復揭示蕭何修建宮殿隱含的政治性目的，早已超越居所功能的普遍意義。既然如此，燦然一新的長樂宮作為劉邦的居所，它的意義就有敘述的必要。作為全新的空間，長樂宮的存在賦予在場域裡的神聖性。既然它作為彰顯皇帝新權威的一種展現，宮殿的金碧輝煌，至高則至上，烘托劉邦身份尊貴之餘，高大也與他自身建構的彪炳功業成了正比，彰顯劉邦個人至高無上的權威象徵。那麼，這個象徵著劉邦新權威的建築物，無論是建造者（或主導者）自身有意凸顯長樂宮的高、貴、大的任何要素，或是其他人所能感知的象徵，他們獲准進入這個神聖場域，一旦踏入就有必要遵守規則。

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一座嶄新的宮殿。儘管在事實上，長樂宮是在舊的基礎上重建而成，劉邦也不是剛即位的皇帝（他也無法如此做），但透過修整翻新，標誌著物的去故就新，同時也象徵著人的淨化。鑑於此，簇新的空間也意味著它

<sup>35</sup> 根據操演有月餘的時間，叔孫通與弟子們操演的空間是外在的開闊空間，而不是直接在宮殿裡面進行，有可能長樂宮建峻在前，但為了維護新場所的象徵意義，他們不太可能就被允許進去作長期的演練。

<sup>36</sup> 即使我們無法得知長樂宮的表面建築物有多宏偉，內部構造、內外裝飾實無所得之，但透過挖掘、夯土的建築基址，長樂宮 6 號建築遺址，面積東西長 116、南北寬 197 米，同時也發現戰國秦或秦代的建築基址，劉慶柱推測為長樂宮前殿，或許能夠提供某種意義上的參照。徐龍國：〈漢長安城考古的收穫、進展與思考〉，《南方文物》第 2 期（2022 年 2 月），頁 16。

<sup>37</sup> 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高祖本紀》，頁 170-172。

是乾淨的、未被污穢沾染的，將陳舊的過去劃分開來。全新的宮殿隱喻著劉邦全新的權威，雖然它是在舊的基礎上建造起來（意即從前的劉邦），卻意味著一個重生的劉邦權威，從前權威不彰的他被消除了。與之相反，對人臣而言，從前的劉邦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劉邦權威。因此，他們有必要根據新權威的誕生，靈活地調整自身的言行，時時約束自己，不去破壞這個象徵性意義濃厚的新生權威。任何的言行舉止若被視作不恰當，都被視作塵染，試圖以下犯上，挑戰帝王權威，無論是破壞它的高貴或偉大。上述除了空間以外，叔孫通也借助時間的重生賦予新權威的誕生，強化它新生的重要意義。

在時間點上，叔孫通選擇諸侯群臣共同參與的週期性慶典，很可能是經過一番思考的。由於西漢初期沿襲秦國曆法，以顓頊歷的十月為歲首，<sup>38</sup>歲首作為非日常時間，相當於新年，它的象徵意義相當濃厚。<sup>39</sup>畢竟週期性的「歲首」，不像白晝與黑夜般頻繁且短暫，它意味著新一年的開始、時間的創生，象徵著一個原生時刻的重複：時間行到盡頭，又重新返回來的象徵。與此同時，歲首也具備了月、日的最初的意義，基本上集合了年、月、日三者重疊後，環繞著「最初」的重要涵義。<sup>40</sup>與之相反的，新年被視為消除去年舊有被耗損的時間，意味著去年的終結。時間意義上的歲序更新，包蘊著萬象更新的意義存在。因此，在新週期的開始，過往的負面積習將伴隨著新年的來臨而革故鼎新，過去行為在新的時間週期以後，將會有所差別。這也昭示著之前：功臣爭功諉過、大呼小叫、拔劍擊柱的紊亂景象，將伴隨著新週期的更迭消亡在逝去的時間裡，它將不復存在。至於人臣也有改過遷善的必要，在嶄新的一年，遵從新規則。歲首的橫刀一切，將過去與當下清楚切割，劃分成兩個對立的情況，象徵著從混亂轉向秩序的開始。

鑑於此，朝儀借助兩個強烈象徵性來獲得重生，使得它的推行既有明確的指涉性，同時也連帶強化新朝儀開展的合理性。為因應建構劉邦新權威刻意將朝儀擇日而行，取得順應宇宙的規律性，達成自然週期與人之間的和諧，新的時間發

<sup>38</sup> 「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東漢徐幹（171-218）的敘述：「大漢之興，海內新定，先王之禮法尚多有所缺，故因秦之制，以十月為歲首，曆用顓頊。」漢朝以十月為歲首，乃是沿襲秦朝的曆法，足以證之。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秦始皇本紀》，頁110；東漢·徐幹：《中論·曆數》，收入俞紹初輯校：《建安七子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295。

<sup>39</sup> 從「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臘明日，人眾卒歲，一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也。四始者，候之日。」不難理解，漢代時候四時觀念還是相當濃厚的。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天官書》，頁476。

<sup>40</sup> 朝儀刻意選擇歲首進行，就要回歸到西漢初期他們如何看待十月：「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這意味著十月實際上漢蘊含著他首次取得重大成就入關成為漢王，奠基漢朝基礎。對劉邦或漢朝而言，意義非凡。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張丞相列傳》，頁1067。

端賦予朝儀創生的重要意義，新朝儀也因而與其他日常、舊有的朝儀區分開來。新空間同樣有送舊迎新的涵義，儘管劉邦以四海為家，但越靠近核心，空間就越顯得神聖性，新建峻長樂宮內的迎接歲首慶典活動，自然也透過建築物新落成而有了迎新送舊的特殊意義。更為關鍵的是：任何的活動，無論歸屬在慶典的範疇與否，都必然有一套嚴謹的儀式規範。新朝儀的頒行，象徵著既存禮儀規範的淘汰。換言之，它摒棄人君與人臣的舊關係，以新的君臣關係取而代之，不止牽動各個層級官員之間而已，也意味著面向帝王的君臣關係：不論人君或人臣，也必須依照新禮儀來重新確認他們的身份與地位。它不是單純的慶典活動而已，而是隱含著濃厚的政治性目的。

從中可見，叔孫通很成功地透過三個截然不同的屬性，運用大宮殿的落成（空間）與新年的開始（時間），疊加與深化「新」的內蘊，將新建構的朝儀規矩串聯在一起，形成異質卻又強烈的新共同體象徵。借助新的空間與時間重新賦予豐富的內涵，才順利地建構全新的劉邦權威。與此相反，新朝儀作為單個象徵，倘若脫離新時空的意義而單獨推展，它的效果很可能被削弱，甚至遭受到反抗的力量。人臣意識到劉邦的轉變，彰顯的是他作為人特殊性。儘管刻意選擇新的時空來建構劉邦的新威儀，但人臣的自覺性並不是透過自身來確定，而是透過儀式操演來達成。由於造成朝儀失序的對象是功臣，如何透過操作朝儀來凸顯不容侵犯的威儀，朝儀構建的歷程與流程，顯然是關鍵的觀察內容。

## 肆、「以次」的重申：朝儀與權威的重建與強化

新朝儀在象徵性濃厚的時空開展，實際上早在執行朝儀儀式之前，叔孫通與劉邦雙方互動中隱晦地彰顯出差異性。觀察新朝儀構築的歷程，無論就叔孫通個體或人臣作為群體概念，劉邦承擔的義務明顯少於人臣。比較顯著的差別在於：他不是規範的直接制定者（也無需成為），但規範處處依循他的意志而行。換言之，強化差異性早在新朝儀開展以前的準備工作有意識地執行。

「起朝儀」雖由叔孫通發起倡議與構建，但朝儀以劉邦唯命是從，呼應他強調個人操作的簡易、可行性要求來進行，而非依據古代禮儀規範的詮釋。史書的記載，隱藏著許多的細節：

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叢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群臣習肄，會十月。<sup>41</sup>

朝儀建構伊始，出席操演、操作細節等，均由叔孫通及其弟子來承擔。作為主官的他，固然并無到場參與的義務。然則一切就緒後，他僅僅透過一次的觀禮，就以他的能行與否，得以拍板決定。

進而言之，從朝儀的構築准許、操演再到落實，一概以劉邦馬首是瞻。他至高無上的尊貴身份，牽動著朝儀關鍵性的走向：從朝儀試行過程中，他是唯一的核准者、把關者，而非由其他第三方來擔任，或受制於文獻權威的約束，群體必須遵從他的標準。朝儀不再是聚焦於君臣各自承擔的義務，而是轉移到人君能否執行、願意與否的個人意志單方面來考量，他無需徵求其他人的意願。與之相反的，人臣是否應該、承擔義務合理與否的問題，並不在人君考量之內。換言之，儀式裡的核心是他，他卻不在儀式現場；處處有他的影子，卻又處處沒有他的存在，劉邦個人與眾不同的差異性與優先性，就充分地顯露出來。由此觀之，新朝儀從雛形到完善的構建歷程，事實上就充分體現身份尊卑差異性的強化。接續的新朝儀執行進程，也能印證相關的論點。

關於朝儀的記錄，司馬遷《史記》對此有一段簡略卻又極為重要的敘述。透過朝儀操作流程的記錄，很好地向我們展現叔孫通精心策劃的朝儀，本質上是大朝會的慶祝典禮。分成由祝賀與酒禮構成的盛會，幾乎涵蓋了中央與地方的重要官員。特事借助新宮殿、新年順利開展的新朝儀，在眾臣操練習肆成熟以後，於漢七年（200B.C.）舉辦：

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譴諱失禮者。<sup>42</sup>

<sup>41</sup> 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劉敬叔孫通列傳》，頁 1086。

<sup>42</sup> 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劉敬叔孫通列傳》，頁 1086-1087。另外，西晉司馬彪（?-306）的記錄了一段東漢舉辦大朝會的細節，可參照互見：「每（月朔）歲首[正月]，為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鍾

朝儀選擇在天微微亮的平明，由代表著帝王意志的謁者，帶領諸位臣子依照身份尊卑的標準，「以次」進入殿門列隊等待。人臣是被動的參與者：儘管作為參與者，他們對於朝儀舉辦的場域、時間、對象等，均排除在決策之外，不容有絲毫討價還價的灰色地帶，全然不見個人意志的自由展現。就連出席朝儀與否的選擇權，他們也不容擁有。畢竟拒絕參加，相等於不承認伴隨身份所需肩負的義務，連帶挑戰劉邦的帝王權威，將會面臨國家機器處置的風險。<sup>43</sup>

縱使在歲首，嶄新的長樂宮並無濃厚的喜慶氣氛，它的氛圍嚴厲而肅穆。透過外部環境的張羅，威風凜凜的騎兵、步卒等構成的元素，我們觀察到大朝會更多展示的是軍事層面的威嚇。尤其「設兵」、「張旗志」作為軍事行動的象徵物，有準軍事行動的嚴肅意味。旗子不僅僅是一塊布料裝飾而已，兵員也不是為了陳設，它決定了接續行動的化身，展現更多的是軍隊的震懾力。<sup>44</sup>群臣感受更深刻的肅殺氣氛，自不會談笑自若：對於久戰沙場的軍功成員，有助於快速進入行軍隊伍的警戒狀態；對軍事活動較為陌生的人臣，則感受到外部環境的衝擊只有更為強烈而已。無論如何，儘管兩者感受有強弱之別，卻一致指涉著——他們步入強調紀律性且弱主動權的陌生空間。這也營造出一種：他們不容抗拒，只有被動接受安排和處置的感覺。畢竟，劉邦新樹立的威嚴，是不容侵犯與踐踏的。

那麼接續的，身份地位高貴的諸侯王、功臣、列侯、宰相等人；低至普通軍吏、文官等人，在車騎、步卒等的監視下，一如進入殿門般：以尊卑為核心原則，「以次」進入嚴肅的空間。在慶典會場裡，他們個人不得展現隨意性，偌大的長樂宮鴉雀無聲，諸位臣子斂容屏氣。移步時的「趨」，闡明了群臣不太可能允許邁著隨性的步伐，雍容自若地移動，而是邁著小碎步地快速移動。<sup>45</sup>群臣在眾人

---

鳴，受賀。及贊，公、侯壁，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賀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錫宴饗，大作樂。其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歲首大朝，同樣有百官祝賀、酒宴。司馬彪補充了一些細節，除了音樂外，尚有「贊」（委贊之禮）人臣向人君獻禮表示臣服這一環節。叔孫通的朝儀，不排除在受賀時進行。東漢蔡質（？-？）的《漢儀》記載更詳，或可參考。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註：《後漢書·禮儀志中·朝會》第11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3130-3131。委贊之禮研究，參見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頁102-104。

<sup>43</sup> 「三月乙丑封，元鼎二年，坐使行人奉壁皮薦，賀元年十月不會，免。師古曰：『以皮薦壁也。時以十月為歲首，有賀而不及會也。』」即便有賀，卻來不及參與，仍然會遭到處置的可能。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王子侯表》，頁458-459。

<sup>44</sup> 我們觀察到設旗很多是作為判別己方、對方身份的作戰行動，例如〈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裏張良「以韓申徒下韓國，言上張旗志，秦王恐，降」；〈高祖本紀〉載劉邦擊破南陽城時：「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市」；〈韓彭英盧吳傳〉記載韓信、張耳攻打趙國時：「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漢為皆已破趙王將矣，遂亂，遁走。」劉漢政權草創初期，大多是歷經過秦末烽火四起、楚漢激烈爭奪時的人臣，他們對於軍事行動，並不會感到陌生。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頁334、161；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頁1868。

<sup>45</sup> 相反的，「入朝不趨」就成為嘉許的性質。蕭何曾經獲得相關豁免：「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蕭相國世家》，頁776。

注目下展開行動，依據事前規劃的文官、武官的性質分類，再度按照尊卑次序的原則，移動到符合自身身份的方位、位置。<sup>46</sup>值得關注的是：歸類使得本來面向帝王的群臣，先透過雙方位置方向的「東鄉」、「西鄉」轉換成面對面的形式，讓他們明白自身與他人身份的尊卑高低，透過更小的圈子強化差異性，不僅僅是更大範疇的君臣尊卑有別而已。

管理大朝會的專職人員確認會場萬無一失後，向上通報、傳達指令，為劉邦的進場預先準備。<sup>47</sup>最終他在眾人擁護下，坐輦隆重登場，這也標誌著祝賀儀式的開始。此時長樂宮裡百官的傳聲唱警，無一不是透露了君臣身份的截然不同。<sup>48</sup>於此之前，人臣必須引頸期盼著他的出場，拉長眾人等候的意味，無不是隱含著他是眾臣中心的超然身份。他既尊且貴，連帶出現都必須有傳警的頂門一針，提示眾人務必整衣斂容，擺脫鬆散的姿態。他是整個場域的核心，現實裡固不容置喙，移動中亦復如是。從他動身前來的路程，透過眾人圍繞轉移過來，猶如眾星拱月般來中心化帝王。他無需依靠自身走來，輦作為中介，闡明了他連體力都不允許絲毫的虛耗，以顯尊貴。劉邦在移動中，既然是彰顯了帝王的位子，對他那個位子的感覺是尊貴的。反之人臣，對自己的位子相對卑微的，促使他們自覺地透過某種慣性的舉動，來感知自己是大眾的、平凡的感覺。

隨著最高權威的現身，揭示著祝賀禮儀的開端。殿下群臣依舊秉持位尊者先行的大原則，上至諸侯王，下到六百石官員的朝賀環節完畢。值得關注的是：諸侯王與各層級官員的輪流奉賀，卻是「振恐肅敬」，情緒是緊繃的，心態是局促不安。對他們而言，很有可能是全新儀式導出的新體驗。待至第一階段的朝賀禮完畢，酒宴正式登場，它的敬酒次序，仍然是環繞著尊卑有序開展。他們必須彎曲身軀來展示卑微，既讓他們意識到人臣之間的尊卑，更進一步拉開最高權力者的距離。儘管劉邦在新的一年裡接受臣子的祝賀，仍需依照自身位階來進行，與

<sup>46</sup> 臣子移動有嚴格的限制，相當講究。特別是張家山〔三三六號墓〕的出土簡牘，年代以漢文帝七年（173B.C.）的《朝律》簡為上限，對於朝儀的舉辦時間、參與者、方位、次序等，有彌足珍貴的補充：「後五步，北上，謁者一人立東陞，〔陞〕者南，西面，立定，典客言具，謁者以聞，皇帝出房，奉常賓九賓及朝者。」荊州博物館編：《張家山漢墓竹簡〔三三六號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年），頁212。此外，曹旅寧對張家山漢墓朝律的研究，推測其制定年代、延續源頭，也點出儒生積極參與漢初政治建設，簡文的朝位也得以反映出當時政治地位之高低以外，漢初律並無正律與旁章之別。見曹旅寧：〈張家山336號漢墓《朝律》的幾個問題〉，《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2008年2月），頁14-18。另外，關於湖北荊州胡家草場漢墓出土簡牘的《朝律》，見熊佳暉：〈胡家草場漢簡《朝律》所見文帝時期的朝儀與職官〉，《江漢考古》第2期（2023年4月），頁70-78。肩水金關漢簡的《朝儀》的近代研究成果，見張英梅：〈漢文帝七年《朝儀》詔書研究〉，《敦煌學輯刊》第1期（2018年3月），頁124-131；〈漢文帝七年《朝儀》詔書補考——以《肩水金關漢簡》（四）所見簡牘為依據〉，《敦煌研究》第3期（2019年6月），頁104-109。

<sup>47</sup> 「《集解》：《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為臚。』」無論如何，負責人必須確保兩方準備妥當，準確無誤地傳達訊息。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劉敬叔孫通列傳》，頁1086。

<sup>48</sup> 唐代司馬貞（679-732）《索隱》轉引東漢劉邵（?-?）的《漢儀》：「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劉敬叔孫通列傳》，頁1087。

此同時，喝酒也有節制的必要，不至於造成禮儀的逾越。縱使貴如諸侯王，他們面對劉邦，身體仍然是被限制的，任何依照命令挪動的身體，有必要透過彎曲姿勢來表達。這一套精心安排的行為規範，強調人臣在吃喝之間，時時都要自我克制來服從嚴格的行為規範，行為得體。

就酒宴現場而言，他們無法完全放懷大笑，隨心所欲行動，他有義務執行人臣的角色，始終如一。他們不斷地被代表著皇帝意志的御史在背後觀察，像是皇帝的眼睛，分散式地觀察着。無論是行為言語，都必須矩步方行，合乎規範。人臣也會透過他人的反應與自我的督促，不斷提醒自己全神貫注於言行。一直到「罷酒」為止，才標榜著第二階段的酒宴收鑼罷鼓。與此同時，不如儀者將帶離現場，準備接受懲處，他們無疑會為自身的行為感到羞愧。由此可見，無論從精神或身體層面上，人臣得以活動的場域漸趨縮小，乃至於固定化，不再有不確定性的活動邊界。除非是被准許的，否則他將被視作挑戰最高權威的權力，而被迫離開席間。這意味著：人臣不再俱備參加酒宴的權利，除非他確保執行命令。「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更是直截了當敘述大朝會驗收了顯著成果。基本上，群臣野調無腔的失禮言行，總算透過新朝儀刀過竹解，成功地撥亂反正。從劉邦的「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不難發現他對自身角色的滿足。<sup>49</sup>他成功透過叔孫通建構一連串的儀式，構建了自身作為帝王無上的權威，他的舊經驗成功被新的正面體驗所覆蓋。

此次大朝會相對過往可謂大相逕庭，取得的成果顯揚昭著。基本上，我們可以總結大朝會的兩個重點：第一，嚴格執行尊卑次序性的新作為。從大朝會進行的流程裡，出現且強調次序的「以次」，不難觀察出以尊卑為主軸而開展。尊卑的次序性不是全新的標準原則，蓋因它原本就存在於關係之中。然則它作為核心原則貫穿大朝會的活動裡重新強調，事實上等於宣告大朝會將以新的面貌展現，相等於它是新的執行力度。值得一提的是：新朝儀的次序性帶有雙重維度。首先，它重新整頓人臣之間的尊卑關係。即使是同僚關係，也有尊卑／上下／先後的差異性。鑑於此，從列隊等待至祝賀、飲酒等，環繞著尊卑有序的原則，而不是平等原則。聚焦於此，無非是回應新朝儀建構的背景——人臣之間因攬功爆發的衝突。冀望透過人臣上下關係的再強化，能夠安撫位尊者、抑制下位者的脫序言行，不至於冠履倒施，重新建構嚴格上與下的從屬性。其次，它也重整臣子跟帝王之間的統屬關係。儘管劉邦與眾臣有鄉曲之情，歷經大小戰爭，但伴隨著劉漢政權的建立，他的身份也因而至尊至貴。在新朝儀裡的祝賀、飲酒活動裡重新強調，

<sup>49</sup> 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劉敬叔孫通列傳》，頁1087。



根據身份秩序井然地執行，尊者與卑者身份的截然不同，就得以擺脫舊的影子，重新彰顯出來。而劉邦作為眾人的最高貴者，自是被歸限在次序裡的最優先順序。人臣既透過劉邦分類了自己的位置卑下，自身也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了分類。進一步而言，人君與人臣的從屬性就建立起來，從而營造出對帝王權威的敬畏。

第二，解除人君義務承擔的繁瑣禮儀，強化再生的君尊臣卑關係。以「再生」稱之，無非是在既有的君臣關係上的重新建立，連帶著兩者務必負責的禮儀義務產生質變。君臣原本在大朝會得以雙向地展現身份的機會，基於人君要求，因此禮儀義務轉嫁到人臣。雙向約束進而形成人臣單向執行禮儀，大朝會成為人君彰顯權威的平台，人君權威無形中不受制約，相對於新朝儀執行前君臣的禮儀共識，相去甚遠。<sup>50</sup>人臣被反復灌輸的是：人君權威之超然，他們則相對卑下。既然如此，劉邦與人臣承擔的義務——多寡、輕重，自不應成正比。最初，他一錘定音決定朝儀的最終走向；新朝儀舉辦時，他最後才現身，無論是身體或精神，他得以輕鬆自在地展現自己，無需擔憂懲戒，這一切，均是對於他帝王身份尊貴的強調。基於他的至尊至高，不允許與他人相似、接近，因而得以超乎尋常。至於人臣，則承擔大量的義務，僅僅從進入會場的進程：從停止、等待、進入、聚合，無一不是被安排著，已然闡明人君身份的優先性，人臣的卑微；構建朝儀到舉辦朝會：時間、位置、行為、情緒等，他們都必須遵守規定來運作。在空間上，人臣必須依據自身的資格被安排；在時間上，他們需要經歷長時間的等待；在言行上，他們只允許做某些舉動；在情緒上，人臣不得隨意展現個人的好惡，任何的違禮難逃懲戒。這也標示著劉邦重新建構君臣關係，消弭宴會的平等原則，<sup>51</sup>對言行舉止的多樣性不再寬容，統一行為來強化上下階級的差異性。

週期性質的慶典若有穩定的循環來形成長久性，將有助於重現來獲得執行的自覺性。新朝儀建構後，若以循環的模式不停地重生來延續，無論在內容層面，或執行將日臻完善。<sup>52</sup>同樣的，帝王對於建構自身權威不會輕易滿足，勢必在原

<sup>50</sup> 〈黥布列傳〉記載黥布（?-195B.C.）首見劉邦：「淮南王至，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魏豹（?-204B.C.）投降劉邦陣營後再度倒戈，謝絕勸降而言：「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事在〈魏豹彭越列傳〉。此外，司馬遷在〈張耳陳餘列傳〉記敘一段較少人注意到的暗殺的事件，是基於人君慢於禮儀而引發，事在新朝儀舉辦以前：「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裼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墮禮。高祖箕踞置，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可見透過禮儀，過於彰顯人君權威，會引發他們的反彈。分別見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頁1034、1029、1026-1027。

<sup>51</sup> 我們比較之前的朝儀，其效果是不彰顯的。功臣的紀律行為，是比較多仰賴自覺的，而不是強制性的規定。在之前，臣子是具備與皇帝爭奪權威、削弱權威的時候。權威者不是固定不變的，並非由劉邦穩定地支配著。從初期追溯朝儀制定之前，就顯然有記錄。一則皇宮宴飲的失控場景，很巧妙地宴會間紀律的鬆散——臣子喝醉後把劍砍柱的行為，是率性和被原諒的舉動，縱使劉邦的態度上是不歡喜的，但臣子還有展現比較失控性的一面。

<sup>52</sup> 肩水金關漢簡裏關於漢文帝七年《朝儀》的簡牘，或可提供我們瞭解朝儀逐步改造的歷程。例如漢文帝時期，他曾經

有基礎上踵事增華。<sup>53</sup>因此，每一年固定形式的操演，其意義不再是過去式的歷史，而是現在式的進行。任何大型儀式的再現，意味參與者再度進入再現，在這個場地時間差被消弭。無論是人君或人臣，透過操演來明確化自己的位置，在潛移默化中建立尊卑有序的群體意識，復刻記憶而形成自覺性。他們身體的自我意識已被淡薄化，取而代之的是人君間接的意志控制。顯然的，帝王不願意透過行使權力來獲得直接的支配，畢竟容易引起集體的反彈。鑑於此，運用比較隱性的模式，借由禮儀規範反復灌輸人臣的認同，使其潛移默化中承認施行的合理性，習以為常地遵從安排。類似的自覺，很容易滲入到出作入息之間，<sup>54</sup>惟與本文專注新朝儀的建立並無太大關係，故不再贅述。

## 伍、結論

本文以西漢初期叔孫通「起朝儀」與劉邦權威之間的關係為主軸，分析新朝儀建構的起因，以及它如何有效地重整尊卑關係。結論有兩點：

第一，劉邦省卻秦苛儀，表面上因應個人因素，解除人君的行禮義務。實則這個舉動，也解除人臣之間的禮儀義務，進而造成上下層級同僚因爭功而無視尊卑關係，連帶削弱已經為此尊卑關係加持的帝王權威，才是群臣酒宴紀律不彰的主要因素。鑑於此，重構帝王權威並非單純地應和帝王個人對於權威的期望而已，它同時也關涉劉邦對組織內部共識分裂隱患的處理。因此，叔孫通選擇以大朝會對秦儀的再利用，是針對問題因酒宴而起，終結亦須在酒宴的思考，畢竟大朝會酒宴所俱備的公開性、典型性，是重建人臣之間與君臣之間的從屬關係的重要平台。在契合劉邦要求的易知、易行後，新朝儀的單獨現身，充其量代表著新

---

將十月大朝會改為正月朔旦朝賀、改動漢初上計時間，調整臣子朝位以及朝賀時合樂的舉措。相關研究，見張英梅：〈漢文帝七年《朝儀》詔書研究〉，頁 124-131；〈漢文帝七年《朝儀》詔書補考——以《肩水金關漢簡》（四）所見簡牘為依據〉，頁 104-109，此不贅述。

<sup>53</sup> 帝王對於權威意識，往往是有增無減：「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群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劉邦顯然意識到人君與人臣的差距性，才會主動要求人臣議論天子服飾。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魏相丙吉傳》，頁 3140。

<sup>54</sup> 劉邦征討黥布時病重，厭惡見人。儘管情況危急，作為功臣的周勃、灌嬰、樊噲等人，均不敢進入：「高祖嘗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群臣。群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皇帝權威的不容侵犯，顯然可見。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史記會注考證·樊鄴滕灌列傳》，頁 1058。

規則而已。叔孫通建構的新規則，借助新時間、新空間所蘊含的去舊除新的象徵深意，賦予它的推展即合於自然，應於人事，它的出現更顯合情合理。

第二，新朝儀重新確立的不只是君臣關係的君尊臣卑觀念，人臣之間的從屬性也在其中。對於君臣，新朝儀透過多面向、多層次來建構：從氛圍的營造、位置的高低、遠近、移動的急緩、動作的抑揚、心態的畏懼與無畏、情緒的等，它傾向於建立君臣之間的差距性，更多是聚焦在製造對比，拉大兩個位置的基點。差距越大，君主的權威越高，人臣則相對卑下。至於臣子之間，則透過比較單一的形式——次序，以身份尊卑為衡量的標準來決定先後。相對於君臣的強烈對比，它更加側重在同中有異的同僚關係，比較少強調之間的差距。

綜上而論，叔孫通的新朝儀是有意識的聚焦於帝王權威，運用大朝會多面向的對君臣、臣子之間，重建尊卑有序的禮儀實踐。它基本上展示了西漢初期儒生如何運用禮儀知識，轉化既有的統治階層觀點，達到進入政治結構的目的。

## 參考文獻

### 一、古籍

- 漢·司馬遷撰，瀧川龜太郎考證（1998）。《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大安出版社。
-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1962）。《漢書》。北京：中華書局。
- 東漢·荀悅，晉·袁宏撰，張烈點校（2005）。《兩漢紀》。北京：中華書局。
- 東漢·鄭玄註，唐·孔穎達疏，龔抗雲整理，王文錦審定（1999）。《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註（1965）。《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
- 宋·黃士毅編，徐時儀、楊艷彙校（2014）。《朱子語類彙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明·李贄（1974）。《藏書》。北京：中華書局。

### 二、中文書目

- 孔維京、王燕（2017）。〈漢初禮法流變探微——以叔孫通「製禮作樂」為中心〉，《大連大學學報》，38, 4: 29-33。
- 尹鵬、王文英（2020）。〈「白馬之盟」真偽探〉，《新鄉學院學報》，37, 2: 56-59。
- 王子初（2018）。〈漢初的禮樂重建與叔孫通〉，《中國音樂》，2: 23-34。
- 王勇（2007）。〈論叔孫通制禮作樂兼採楚俗〉，《湖南科技學院學報》，28, 11: 10-12。
- 甘懷真（2004）。《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李冰楠（2021）。〈叔孫通制禮再評析——以與同時期儒生的聯合考察為中心〉，《河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2, 1: 87-93。
- 李莉（2016）。〈新時期以來儒家學說與漢初政治關係研究述評〉，《史學月刊》，8: 115-125。

- 林聰舜（1993）。〈叔孫通「起朝儀」的意義——劉邦卡理斯瑪支配的轉變〉，《哲學與文化》，20, 12: 1154-1162。
- （2013）。《漢代儒學別裁：帝國意識形態的形成與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俞紹初（1989）。《建安七子集》。北京：中華書局。
- 徐光冀（2012）。《中國出土壁畫全集》。北京：科學出版社。
- 徐復觀（1976）。《兩漢思想史》。臺北：學生書局。
- 徐龍國（2022）。〈漢長安城考古的收穫、進展與思考〉，《南方文物》，2: 11-27。
- 荊州博物館（2022）。《張家山漢墓竹簡〔三三六號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 張英梅（2018）。〈漢文帝七年《朝儀》詔書研究〉，《敦煌學輯刊》，1: 124-131。
- （2019）。〈漢文帝七年《朝儀》詔書補考——以《肩水金關漢簡》（四）所見簡牘為依據〉，《敦煌研究》，3: 104-109。
- 強中華（2010）。〈叔孫通儒學實踐批判之批判〉，《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1, 6: 120-124。
- 曹旅寧（2008）。〈張家山 336 號漢墓《朝律》的幾個問題〉，《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 14-18。
- 傅志傑、李俊芳（2014）。〈叔孫通制朝禮新探〉，《保定學院學報》，27, 3: 48-51。
- （2014）。〈漢代大朝會相關問題研究〉，《商丘師範學院學報》，30, 7: 43-46。
- 楊寬（2003）。《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楊賽（2015）。〈叔孫通與漢初製樂〉，《音樂藝術》，3: 82-91。
- 楊鑫（2016）。〈叔孫通之「進退與時變化」與漢代儒學的轉向〉，《孔子研究》，2: 86-92。
- 熊佳暉（2023）。〈胡家草場漢簡《朝律》所見文帝時期的朝儀與職官〉，《江漢考古》，2: 70-78。
- 劉力、李爍（2020）。〈叔孫通「起朝儀」的禮樂之制與皇帝制度的重塑〉，《重慶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6: 25-32。
- 劉振東、張建鋒（2006）。〈西漢長樂宮遺址的發現與初步研究〉，《考古》，10: 22-28。

「起朝儀」與劉邦權威的再建：以《史記》為核心的觀察

劉鳴（2012）。〈「白馬之盟」真偽辨〉，《秦漢研究》，6: 220-228。

鄧偉志（2009）。《社會學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 三、中文譯著

溝口雄三、小島毅（2006）。《中國的思維世界》，孫歌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David Israel Kertzer（大衛·科澤）（2015）。《儀式、政治與權力》，王海洲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Drawing up the Court Ritual” and the Re-established of Liu Bang’s Authority: An Observation Based on *Shiji***

Loon Wan Sim<sup>1</sup>

## **Abstract**

The focus on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ze how Shu-sun T’ung drew the new ritual for the court to re-establish Liu Bang’s authority. This article includes five sections: Firstly, the introduction will briefly lay out the main issues for discussion about the research review. The next section reveals the factor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ourt rituals and Shu-sun T’ung’s selection criteria. The third section analyzes the symbols that he used and their prominence through the new ritual for the court. The fourth section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new court rituals to re-establish Liu Bang’s authority through multiple aspects. The conclusion summarizes the extended significance of new court rituals.

**Keywords: Liu Bang, Authority, Principality/ Bordination, Ruler/ Ministers, New Court Rituals**

---

<sup>1</sup>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Loon Wan Sim, E-mail: loonwan85@gmail.com  
Received: 2023/04/06; Accepted: 2023/06/26

